

国债拍卖 遭遇两年来首败折射啥

由于国内市场资金面持续偏紧,直接导致一级市场上新发行的国债在拍卖时首次因认购倍数过低,出现罕见的部分流标现象。上周五,财政部计划发行150亿元记账式国债,但招标结束后实际发行仅为95.3亿元。(6月17日《广州日报》)

在国债一级市场财大气粗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竟然拿不出资金认购国债,虽然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但是近年来还是罕见的。这再次折射出目前笼子以内金融机构之间的“钱荒”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越来越严重了。

严格地说,这已经是政府背景的债券在不到10天以内第二次流标了。本月6日,上海隔夜同业拆借利率大涨231.2个基点至8.294%,作为资金面紧张加剧的“牺牲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6日招标的200亿元6月期金融债惨遭“滑铁卢”,最终仅获得115.1亿元的认购,投标倍数为0.576倍,出现罕见流标。

大家都在分析寻找造成市场流动性特别是笼子内金融机构之间资金突然紧张的原因。不外乎是这几个原因造成的,债市监管带来的去杠杆行为、外汇占款增量下降以及半年期银行理财产品集中到期等。

其中,外汇占款增量的急剧下降影响较大。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新增669亿元,创6个月来新低。大大低于1000亿元的市场预期。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信贷操作应该是压缩贷款、回收流动性,以保持足够的资金头寸应对突发的支付风险,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大肆扩张贷款。四大行6月上旬信贷竟然并增,6月1日至9日,工农中建四大行贷款发放量总计2170亿元,已超过四大行5月份整体信贷投放量,也远超四大行去年6月份整体信贷投放量。这怎能有钱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呢?近期上海银行间市场同业拆放利率一直保持在高位,说明银行间资金面持续紧张。

种种迹象表明,热钱撤离、外汇占款骤降、市场资金异常紧缺等带来的金融风险苗头已经显露。

央行上周四暂停了央票发行和正回购操作,以舒缓市场的流动性紧张局面。这是5月份央票重启后的首次暂停。同时,关于降息和加息争论不休。面对目前经济低迷状况,利率选择是应该降息;而面对热钱大举流出状况,又应该加息,因为如果降息的话热钱流出会更快。

笔者认为,在目前这种两难选择情况下,利率工具暂且不动为妙,而不妨考虑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工具。同时,银行业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商业银行突击放贷的监管,特别是严格限制信贷资金进入地方融资平台。

余丰慧

市场虽在 而电影之神缺席

自6月3日上映以来,《富春山居图》引发了规模庞大的吐槽。除了当年陈凯歌的《无极》,几乎没有一部电影和它的导演在网上得到过如此多的几乎是全民的奚落。以至于刘德华为了《盲探》赶紧“撇清”,而导演孙健君也跑出来接受各家媒体采访,作出关于烂片的回应。但观众边奚落边看,竟使它刚刚突破了两个亿的票房。其实,这半年左右的时间,不仅仅这部片子,先后还有《泰囧》《致青春》《北京遇上西雅图》这样的“投资不多、导演没有过成功作品、故事很一般”的电影,也同样获得票房大胜。

表面上,市场的热度令人欣喜,似乎是文化的复兴和百花齐放;另一方面,当细究这些电影成功的秘诀时,又令人有深深的担忧。

以《富春山居图》为例,它本身的制作成本是1.3亿,宣发成本是3000万;1.6亿的投资中,中影集团和寰亚电影占了投资的60%。而中影集团负责该片的发行,使它具备了先天的排片优势。从去年到今年,它经过四次更换档期,既争取到了没有大片抗衡的绝佳档期,又压倒性地占据了37%的影院排片。导演孙健君名不见经传,从未拍过电影。他多年制作晚会、广告和宣传片(从《富》片中也可以看出他五彩斑斓、大杂烩、没剧情的晚会思维),但他仅手持一份商业计划书就获得了初执电影导筒的机会,韩三平更是亲自介绍了刘德华给他。这样看来,收获两个亿甚至更高的票房似乎也不足为奇。

李安在6月9日的《杨澜访谈录》中,谈到内地过热的电影市场,有过一段话。可以为这个电影做注脚。李安说:“内地的电影市场,也许十年以后比美国还要大。但是希望进入良性循环,而不是恶性循环。”他说什么叫“恶性循环”:“抢钱、抄袭、缺少创意、找明星、相信大牌”。李安进一步说,台湾和香港的电影市场就是被这样搞垮了。

更令人担心的是,《富春山居图》的成功,可能在内地成为一种“烂片也成功”的类型得到效仿。近阶段,坊间已经开始流传“负口碑营销”概念。滚滚如潮的负口碑,反而使一些人走进了影院。这是价值观的扭曲——大多数人已经有了“审丑”和“求虐”习惯,如微博上以爆料口和侮辱人闻名的“留几手”,确拥有524万粉丝。

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无论是炫耀技术和视觉的商业制作,还是人文情怀的剧情片,它首先应该是有了一定贡献和艺术追求的。这样,即使它最终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也值得鼓励。但当导演孙健君说:“总比没人来看强”这样的话时,是毫不尊重电影的。还记得李安获得奥斯卡奖的获奖感言第一句是:“感谢电影之神!”我们的电影人有这样的谦卑和敬畏吗?

如果长此以往,恐怕我们内地的整个电影工业,像台湾和香港一样都会付出代价:先成为金钱的奴隶,导致观众的期待落空,使好片也没票房,最终,整个电影工业都走向衰落。张敬

修订《食品安全法》 公众最期待的是什么?

我国首部《食品安全法》即将启动修订。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介绍,《食品安全法》的修订已经列入国务院法制办今年立法计划。而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亦于近日表示,修法要严格直接责任追究,通过严厉惩罚来治理食品安全之乱。

4年前,《食品安全法》千呼万唤始出来,承载了公众厚望,但4年时间过去,食品安全丑闻依然层出不穷。从“毒牛奶”到“毒大米”,一起起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不断侵蚀着人们的信心,以至于出现国产奶粉少人问津,洋奶粉一罐难求的局面。

说《食品安全法》形同虚设未必公允,但眼下的乱象,显然需用重典来矫正。今年5月的3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总理都讲到食品安全,并明确建立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前不久,最高法院出台《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地沟油”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如果利用“地沟油”加工食品,致人死亡,最高可判死刑。种种情形表明,对《食品安全法》进行修订势在必行。

现在的问题是,修法,什么最关键,或者说,人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客观而言,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对于监管责任也有所涉及,但仍有较大的改进和提升空间。而纵观近年来发生的众多食品安全事件,监管不力也确实是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几乎每一起严重的产品质量事件背后,都对应着无法推脱的监管责任。譬如在蒙牛“毒奶粉”事件中,国家质检总局早在事发前已给各省市质监局

签发“特急电”,其中写道,发现部分省份的个别批次的乳制品黄曲霉毒素M1超标,并要求加强原料乳监控,但事发后,地方质检部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对此一问三不知。又如轰动全国的“毒胶囊”事件中,质检部门竟对大规模造假行为“毫无察觉”,直到媒体介入,人尽皆知,才慌忙行动起来。而即便揪出了责任人,也往往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问责如同挠痒痒,甚至一些在舆论重压之下被免职的官员,没过多久便异地升迁,风光无限。

可以说,监管乏力、追责不到位,是食品安全防线千疮百孔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中,部分监管者干脆同不法分子结成利益同盟,大行苟且之事。不久前,深圳即曾出现过监管者向售假者通风报信的事件。

我国刑法第四百零八条规定,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制假者最高可判死刑相比,这样规定未必严苛,但即便如此,这样法规仍极少能被落实。

去年,深圳几名市场监督管理人员因渎职和玩忽职守被判刑,这样的做法受到公众的肯定。人们希望相关法规能对监管者给予更有力的约束,这不是对哪一个群体施以重压,而是以法律确保公职人员恪尽职守、尽到本分,而这一切,应在《食品安全法》的修订过程中有所体现。

晶文

会海淹没的是行政效能

手拿会议通知,在上海市某街道工作的郑先生一声叹息,这已经是一周内第七个会议通知,“别的事情都不要干了”。过去一年,他先后赴了500场大大小小的会议。一副处级干部更是吐槽开会频繁,自称任务是适时鼓掌。(6月17日《解放日报》)

各种各样的会归结到最后只有两种,一种是有效的解决实际问题的会,一种是无效的不起任何作用的会。有效的会需要与会者身心与会,开无效的会则只是“听会”,到会者带着面孔带着巴掌去就行了。

无效的会只是为开会而开会,几乎就是假会,会议的主持者假模假式,胡吹乱侃,言不及义。听会的人心不在焉,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甚至于在会上旁若无人,呼呼大睡。

“大会中会小会,会有会;你说我说他说,重复也要说”;场面上去热热闹闹,过程与内容不过是冗长乏味,这些都是文山会海的现今写照。会议泛滥成灾,必定滋生严重的会议腐败。哪一场会议都不是白开的,都需要付出成本,就是说这开会非但影响了众人的情绪,浪费了众人的时间,降低了行政效能,还挥霍了稀缺的公共资源。

一个处在生活中的常人,必是分身无术。同一时间段内,做这事就不可能再干那事。热衷于文山会海者,肯定是工作作风浮躁者。穷于应付各种会议,沉溺于繁文缛节,心就难以静下来。在会海中浮浮沉沉,空耗精力和时间,获得一时的虚假的心理满足,人就会消磨了锐气,精神疲软,就不会扑下身子干一些实事。

会议,无非是众人聚在一起议事,其本身是好东西。开会的是建立某种沟通渠道,不同的人共同发声,并寻求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文山会海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障碍,种种弊端,难以述尽。议事之时,你推给我,我踢给你,硬是把沟通变成一场扯皮。云里雾里,把本是清晰明确的事情弄得一塌糊涂。还像条铁链,束缚人的思想,困住想干事人的手脚。

解决文山会海问题,是现实中的极大难题。对有的人而言,开会会上瘾,所以才有“开会迷”之说。没人会否定开会的必要性,关键是开什么样的会,怎样开会。这一切都要有规则,规则既要有可操作性,还要有时效性。

今语

别让“无机青年”怀疑未来

作家方方最新出版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讲述了一个农村大学生的故事。农村大学生涂自强勤工俭学完成学业后,没有人脉、没有背景的他在城市生存疲于奔命,最后积劳成疾患了肺癌晚期。方方感慨,“涂自强即使努力奋斗,也不见得有个好前程;反观另一些人,或许什么都不做,但照样过上好日子。”(6月18日《中国青年报》)

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很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所不同的是,《平凡的世界》悲观里有着乐观,虽然现实是艰难的,但前途是光明的。而涂自强的故事,不仅现实是艰难的,前途也看不到光明。小说开始,涂自强被大学录取,落榜女同学送他一首诗,其中一句是“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这句诗成了涂自强每次遭到挫败时的自我安慰。小说结尾,方方借涂自强的大学同学之口,问了一句话:“这果然就只是你的个人悲伤吗?”

“涂自强”是“徒自强”的谐音。那些出身贫寒,勤奋向上,却依然找不到出路的青年,正是现实中的“涂自强”。看到这部小说以及方方的描述,不禁让人想到了前段时间《人民日报》提到的“无机群体”。而像涂自强这样的青年,则可以称为“无机青年”。

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洗礼,人们早就接受了竞争。市场有竞争,社会也有竞争,既然有竞争,那就有输有赢。而且社会是一种金字塔结构,这也意味着,与少部分人光芒四射相比,大多数人可能显得平凡平庸。我们不能保证终点公平,但起码应该保证过程公平。

“无机青年”的问题,恰恰出在过程中。现实中,一个人未来能够达到的高度,与其出生高度正相关。出生在大城市,自己是“官二代”、“富二代”,未来就能够走得高。这些青年可谓“有机青年”,伴随成长的是一路鲜花一路绿灯,只要他们稍微表现出一点能力,就能破格提拔;即使他们没有能力,也拥有比别人更多的机会。而出生在农村,自己是“穷二代”,那就可能像涂自强一样,虽然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机会总在隔壁,始终不肯过来敲门。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悲伤,而是一个群体的悲伤,一个社会的悲伤。

最可怕的不是没有现实,而是没有未来。现实艰难一点,并不要紧,只要有前途,年轻人愿意吃苦。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愿意在北平上产做一“奴隶”,拼的就是一个未来。可一旦没有未来,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带来的心灵创伤,将直接影响个人梦、中国梦的实现。这也是方方所说的,“靠个人奋斗上升的道路一旦被堵,取而代之的是拼爹、拼钱、拼关系,那国家的未来将没有出路。”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699万人,人数创历史纪录,也因此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而且未来五年,高校毕业生数量还将保持在年均700万左右的高位。就业压力可见一斑。像涂自强那样,“毕业即失业”,恐怕不是个例。这也是我们担心的,当一部分人承蒙祖荫成为“有机青年”时,另外一部分人再怎么努力也是“无机青年”,将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

野百合也有春天,别让“无机青年”怀疑未来。决定年轻人未来的,不能仅仅剩下出身和背景。如何避免“无机群体”的出现,特别是“无机青年”的出现,这是一道现实考题。让年轻人相信未来,让奋斗成就未来,不应该是一个“中国梦”。毛建国

寸步难行因失信

据报道,国务院副总理汪洋17日在北京谈及食品安全问题时强调,“治乱要用重典”,对那些蓄意谋财害命的违法犯罪分子,要严惩,绝不手软。同时社会要强化监管责任,让不安全食品生产经营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

让不安全食品生产经营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有赖于政府的相关法规得到切实执行,有赖于强化全社会的监督机制。只有政府与全体消费者共同努力,才可能令食品安全的市场状况根本好转,让亿万人的餐桌不但丰盛而且令人放心。

吴之如文/画



为“官二代”遇袭叫好是种社会病

近日,6名中国留学生在法国波尔多地区遭到歹徒袭击。这本是非曲直再明白不过的案子,但在法国媒体曝出其中一名受害者是中国前市长的女儿后,中国国内的舆论却出现一片欢呼和叫好声。仅仅因为当一名受害者有可能是“官二代”,幸灾乐祸的报论在国内就甚嚣尘上,网民原本应该高昂的抵御外侮情怀,转身变成以反腐名义捕风捉影的无端揣度和泄愤。

曾经是孱弱中国的热血青年鲁迅,当年看到日本学生在课堂上观看日俄战争录影。当同胞胜利以为傲的民族情绪。血染于水的同胞仅仅因为可能与“官”字沾边,其无端遇袭便引来一片喝彩。我们不得不反思,不论是非、不追究真相的盲目愤怒已成为网民的习惯性思维。而某个事件一旦扯上“官”,就会引来社会的质疑与否定,原本应是人民公仆的官员,已成为网民仇恨的箭靶。现实生活中的角色错位和情感扭曲

当真正强大起来的中国不敢被世界藐视的时候,仇官仇富的社会情绪轻松地从中国内部胜利以为傲的民族情绪。血染于水的同胞仅仅因为可能与“官”字沾边,其无端遇袭便引来一片喝彩。我们不得不反思,不论是非、不追究真相的盲目愤怒已成为网民的习惯性思维。而某个事件一旦扯上“官”,就会引来社会的质疑与否定,原本应是人民公仆的官员,已成为网民仇恨的箭靶。现实生活中的角色错位和情感扭曲

来自何方? 深究社会病因,传统的官权文化是产生仇官心理的根本原因。当衡量社会价值的体系是按照官位大小来排序的时候,合理完善的竞争机制和监督获取机制就应该相应确立,程序正当、信息公开、决策者对决策负责,是获得社会公众对官员亲近与信任的唯一路径。但现实生活中,当官本位与权本位将官与民严格区分,对立情绪就会悄然产生并不断蔓延。

应该看到,社会公众在公开公正条件下竞争,即使失败也会心安理得,而在不正常的社会竞争,即使有所得也会对社会不公有余愤。因此,当前的中国虽然物质生活发生飞跃,但精神层面的焦虑与忧虑却与日俱增,社会戾气由此产生,并且情绪热点不断降低。这也是这起案件在没有弄清清楚遇袭者是否与前市有关的前提下,仅仅凭借仇官习惯性思维,在中国国内引发舆情翻转的重要原因。

官员的形象危机亟须有效化解,网络的戾气同样需要构筑合理渠道宣泄。强大开放的中国离不开一个健康的社会心态,加强官德在民意中的修复与互联网理性情感的建设势在必行。武雷梅

高考状元为何一路向西

高考状元流失海外严重!日前,中国校友会网发布最新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称,高考状元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业后,选择在国内外直接就业或创业的比较少,大多数高考状元选择继续出国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保守估计全国“状元”中出国留学比例高达60%。

这则新闻之所以引发关注,关键词为两个,其一是“高考状元”,其二是“60%”。在社会公众普遍将高考状元作为最优秀学子的当下,如此高的出国率,多少令人耿耿于怀:优秀学子为什么不留在国内,而是选择“一路向西”、远走异乡。

其实,以所谓高考状元为代表的高分考生在本科学业后出国深造也罢,一些学生放弃中国高考、出国留学也罢,越

来越高涨的出国留学热早已经成为近些年来普遍但却值得深思的现象。

不能否认,这是中国日渐强盛、开放、富裕的表现。百余年前,当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人被迫踏出国门,接受外部的世界,大部分中国人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不避河海之险,不惮跋涉之劳”远走他乡。但现在,随着国际交往的日渐频繁,走出国门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不再遥不可及。

同时,这也是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倒逼”人才的结果。当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希望寻找到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时,留洋便成为不少人的努力方向。当然,留学热的出现,也是教育逐渐成为一种“服务”和“产品”,供受众自主选择的结果。无论是内地高校、洋大学

还是港校,选择多了,择优而从就再自然不过了。但是,这种趋势不容忽视。想想看,优秀学子选择“一路向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走出去的理由是对身边教育的失望;选择“一路向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留下的人无动于衷,无所作为,麻木不仁。

这就需要我们的院校深刻反思:如果从整体上真正加以完善,不逐渐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必将会有更多的青年学子“用脚投票”。

从这个角度上说,尽管我们并不提倡炒作所谓的高考状元,但如能通过这份调查报告,引起整个社会对中国教育的反思以及对如何吸引人才回流的反思,那就不失为一桩幸事。 赵婀娜

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

武汉市公交集团透露,近一个月来,武汉市近5000台空调公交车上配备的安全锤已丢失5000把(平均每台车上配备安全锤3-6把),平均每台公交车上每个月就要丢失1把安全锤。(6月12日《长江日报》)

厦门BRT公交车事故让公交安全成为热议话题,也为全国各地公交集团敲响了警钟。紧急排查公交车安全隐患,确保安全带、消防器材等设施齐全,做出这样的反应是及时和必要的,但是,安全锤的习惯性丢失除了疏于监管,还反映出公众良知和社会责任的缺失。

众所周知,安全锤也叫救生锤,它是乘客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就

近逃生的必备工具,但是由于一些乘客将车上的安全锤顺手牵羊,每个月武汉市公交集团都要花十多万元补充丢失的安全锤。这个用途,日常生活中并不需要,我们不禁要问:随意拿走的安全锤到底用意何在?

这些乘客如果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他人不安全的基础之上,甚至以破坏他人安全为前提,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轻者会受到舆论的谴责,重者则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有些人不乏有爱占小便宜的喜好,买卖交易时正常砍价占得的便宜是合法的,但“顺手牵羊”安全锤,置一整车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就不能仅仅是爱占便宜或偷

宋华